

湖南地方文史志鉴丛书

张萍 选集

把理论
研究根植

于实践的沃土上

◎ 光明日报 出版社

张萍 选集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把理论
研究根植

于实践的
沃土上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萍选集/张萍 著.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5. 11

(湖南地方文史志鉴丛书. 2005/徐万君主编)

ISBN 7-80206-165-2

I. 湖... II. 张... III. 地区经济—经济一体化—研究—湖南省 IV. F127.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29142 号

张萍选集

作 者: 张 萍

责任编辑: 邓星煌 王思中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 邮编: 100062

电 话: 010-67078945(发行), 67078235(邮购)

传 真: 010-67078227, 67078233,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mail: gmcbbs@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郝惠珍律师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省怀化建南轻印办公设备公司

开本: 889 × 1194 1/32

印张: 20

字数: 50 万字

版次: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数: 1-1000 册

印次: 2005 年 11 月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80206-165-2

定价: 48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湖南地方文史志鉴丛书.2005/徐万君 主编

全套共九册

★ 怀化学校志/唐广华 主编

★ 怀化民居发展史/舒清富 主编

★ 崛起中的南方肉牛业/林祥金 主编

★ 张萍选集

——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研究史/张萍 著

★ 湖南民族医药发展史/邓星煌 编著

★ 怀化民间文艺发展史/邓星煌 编著

★ 杂交水稻发源地——怀化/吴以平 主编

★ 荆坪古村/刘芝凤 著

★ 楚越古通道发展史/刘芝凤 著



作者简介

张萍,1928年生于河北省藁城县(市)屯头村。1949年8月于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前身)学习结业南下工作,先后任湖南省行政学院、中共湖南省委党校经济学教员,湖南财经学院讲师,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副院长,研究员,湖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团主席,湖南省人民政府科技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等职。并先后任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生产力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横向经济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特约理事,中国区域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南方国际金融学会顾问,以及湖南省市场经济研究会会长、湖南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湖南省生产力学会会长,长株潭经济研究会会长,湖南省老教授协会常务副会长等职。

自1953年以来,长期从事经济学的教学科研工作,撰写、主编出版专著14部,发表论文200多篇。在宏观经济研究方面,在多家报刊发表多篇论文,较早的提出了宏观经济分层调控的理论及其职权划分的建议,改革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是计划与市场两种手段结合,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及建立新体制框架最重要的基础条件等理论观点。在市场经济研究方面,较早的提出了有计划商品经济实质上是国家宏观经济计划指导下的市场经济的观点,提出和系统的论述了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区别与联系,第一次

系统全面的对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改革的特点、规律性和发展阶段,做出了理论的概括和剖析。在区域经济研究方面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1982年提出了把长沙、株洲、湘潭从经济上联结起来建立湖南综合经济中心及经济区的建议,引起了社会多方面的关注。1984年提出了建立长株潭经济区的方案,为中共湖南省委和省政府所采纳。1988年元月提出了建立湘南改革开放过渡试验区的建议,经湖南省政府采纳报国务院批准付诸实施。1990年10月提出了建立湘粤长期稳定经济合作关系的建议,1991年被两省政府采纳和实施。1992年主持和完成了《湖南西线开发战略与布局研究》,进入了中共湖南省委和省政府的宏观决策。在科研活动中,提出和主持完成了多项国家和省部级的重大科研项目,学术论文、研究报告和决策建议多次获全国性和省部级奖励。1992年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1993年被授予湖南省优秀理论工作者,1997年被授予湖南省荣誉社会科学专家等殊荣。

代 序

——50 年的学者生涯^{*}

主题的话：说“50 年的学者生涯”，是有“水份”的。准确的说，我的学者生活应当从 1953 年，任湖南行政学院经济学教员时算起，迄今也就是 47 年。为了凑个整数，读者也许会谅解的。根据我的身体状况，也许还能延续 10 年的研究生涯，那就超过 50 年了。

一、风浪中的平淡

1949 年 3 月步入华北大学，8 月南下到湖南工作，迄今已经 50 个年头有余了。回首往事，心潮翻腾，很难平静下来。50 年代初，当我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读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闪耀着不可泯灭革命光辉的名著时，主人公那种像燃烧的烈火永不熄灭的革命奋斗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我。

保尔曾有过一段深刻概括他革命精神或钢铁誓言的内心独白：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

^{*} 本文是为“华北大学入湘校友回忆录”《风雨征程》一书的出版（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1 年 10 月出版）而作。2005 年 8 月对“离休了，但不能离开学者的岗位部分”作了增补。

这样度过：回忆往事，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生活庸俗而羞愧；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活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

我的人生道路和生活工作的年代，同保尔却大不相同了。我的一生有过不少的过错，更不能同保尔的献身精神相比。但他那种永不熄灭的拼搏精神，却永远激励着我。我经常想，如果我在临死的时候，也能够给自己做出一个这样的结论：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生活庸俗而羞愧。就聊无遗憾，心满意足了。这种念头可以说支配了我 50 个年头！“小车不倒只管推”，迄今仍然支配着我的行动。

自 1949 年 9 月至 1951 年秋，我在湖南革大（抗大式学校）青年团学校团委会任宣传委员兼校俱乐部主任。该年 10 月，到学校第三部（财经部），任学习辅导员，开始转向教学工作的生涯。

1952 年，是建国后第一个转折的年头，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任务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完成了，经济的发展将转向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革。相适应的在干部教育方面，提出了进行正规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的任务。可是理论教员从哪里来？中共湖南省委决定举办一年制的理论教员培训班。可是教员的教员呢？1953 年春，学校（当时已更名为湖南行政学院，任务转为培训在职干部）党委决定从南下的青年干部中选拔 20 多人自己培养。在曾任中共中央马列学院教员、时任湖南行政学院副院长的方克指导下，采取自学为主类似在职研究生那种学习方式培养。我由财经部的学习辅导员调院业务教研室经济学教研组，任教研组长和教员。可是在华北大学，比较系统地学习了哲学、社会发展史和中国革命史，没有学过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在任部学习辅导员期间，也只结合工作学习了一些部门经济理论。怎么办？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刻苦、认真、专心致志，或者说用保尔的精神拚命的去学。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日以继夜，如饥似渴地通读和精

读了已经译成中文的《资本论》等马恩列斯的所有经济论著和将俄文译成中文的政治经济学教程 16 个分册,以及一些古典经济学著作、经济学说史与中外经济史。读书笔记写了厚厚的十几本。当时,由于电有困难,晚上 10 点就把除路灯外的开关全关掉了。炎炎夏日的夜晚,学校的同事们三三两两的在门外坪里和草地上,有的聊天,有的拉胡琴……,我仍在办公楼一楼走廊微弱的路灯下,旁若无人聚精会神的在读书,一边读,一边用手帕擦拭额头上流下的汗珠,一直到深夜。就这样,我终于系统的掌握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1954 年秋,在全省理论教员培训班的讲坛上登台授课了,成了教员的教员,开始了近 50 年的经济学理论的教学与科研的生活。

1956 年 7 月,湖南行政学院合并到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我继续任经济学教员。为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中央规定党政机关干部要进行政治经济学的系统学习,我承担了省级机关干部学习的绝大部分授课任务,由于讲的内容新、教学效果好,也就小有名气了。1958 年春初,一个以粮食和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的浪潮从农村掀起。为了使干部特别是知识分子干部得到锻炼,学校领导决定将党校干部分批下放农村参加劳动,或到基层参加工作和锻炼。我是第一批下放到平江县瓮江乡参加为期一年的劳动锻炼。从该年 3 月始,高指标、瞎指挥和导致的浮夸风越演越烈。我们下放在一起的十多位同事,一方面对浮夸风进行了抵制,并积极向省有关领导部门反映了情况;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积极参加白天下田、晚上上山的“大跃进”运动。我在参加劳动的同时,由于抽出部分时间,协助乡政府创办了一所农业技术学校和颗粒肥料厂,被通知参加了该年 10 月在长沙市召开的湖南省农村技术革新者代表大会,并被授予湖南省农村技术革新工作积极分子的称号,也因此,由高博导演、上海电影制片厂制作的《狭谷里的种声》一片,把我改姓黄,加了一幅眼镜和一条扁担,塑造成一个知识分子干部下放农

村劳动的典型形象。

1960年12月,我由党校调到湖南财贸学院任教。这使我避免了像党校其他同事那样,连续数年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农村社教运动中耗费时光。1966年,从《五·一六通知》开始,带给中国人民一场大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特别是在1967年“夺权风暴”中,由于我属于“保皇派”,该年7月,我和妻子携带四岁的幼儿和在母胎中7个月的女儿,经历了从长沙到韶山,再到衡阳乘火车到重庆,由重庆到西安的“大逃亡”。需要说一说的是,当火车驶入重庆时,激烈武斗的枪炮声震撼了街头和山谷,外逃的人群拥挤在车站的内外,我只好在车站外面的地面上铺上随身携带的草席和毛巾被,让幼儿和怀孕已7个多月的妻子休息一下,从下午4时起我就参加排队购票的“长龙”,到第二天上午9点多,当时前面只有7、8个人,很快就能购到票了,心想终于有望很快离开这里了。然而,我一下子惊呆了,发现后右裤袋里的钱全被扒走了。天啊!重庆没有一个认识的人,这可怎么办?我怀着一线的希望,拿着工作证分别找到了车站的负责人和军管会,恳求能借几十元的车票钱,但无济于事。真是“求天天不应、求地地不灵”,全家几乎陷于绝境!后来,在一个候车的同情人的指点下,冒着战斗的炮火,敲开了一家拍卖行的大门,经再三恳求,一块一百多元购的手表,折为65元卖掉了。用60元买了继续西行的车票,余下的5元钱作全家乘车的生活费,终于脱险了。待第二天黎明走出西安车站时,经历了7个日日夜夜的“逃亡”生活,4岁的幼儿已经变成了一个“小泥人”。待女儿出生满月,回到长沙时,已是10月的深秋了。

在“文革”的惊涛骇浪中,虽然也给我戴上一顶“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但由于我学习刻苦,工作认真,教学效果好,受到学生们的尊敬和呵护,给我封了一个“反动学术权威队”的队长,没有受到大的冲击,比较而言,还算“平安”。

在这近30年的岁月里,从1957年“反右派”到1959年“反右

倾”，从农村“社教运动”到“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的浪潮一浪盖过一浪。由于我把主要精力埋头于书本，对于这些“政治斗争”关心很少，能不参与的就借故请假。虽然不时有些人也给我戴上半顶或一顶“重业务轻政治”或“不问政治”的帽子，我也听之任之，我行我素。也因此，我既没有成为什么“运动”的积极分子或骨干，也没有成为挨批斗的对象，在风浪中总算比较平淡或平安的度过来了。

二、影响波及全国的长株潭经济一体化的建议

1978年2月，我由湖南财贸学院调入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当时单位的名称是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从事经济研究工作（1981—1982年任经济研究室副主任）。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国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开创了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新时期。1982年，中央提出在深圳、珠海等沿海四个城市建立特区的设想，第一个改革开放的浪潮开始从南海滚滚而来。湖南如何利用机遇、加快发展？区域经济发展的规律性是以城市为中心，以交通要道为依托，由点到线及面，逐步形成网络。湖南没有大型特大型的经济中心城市，但有长株潭这个城市群。三市是沿着湘江中下游自然形成的一个“品”字形的城市群，两两相距30—50公里，较之大的中心城市同其卫星城镇的距离还要近得多，从历史和现实看，都有着不可分割的经济和社会的联系，实际上是一个城市综合体。如果三市联合，实行一体化发展，就可以形成能够带动全省经济发展的综合经济中心或增长极。根据这种探索和思考，1982年12月，我在湖南省政协四届六次会议上，以提案的形式提出：把长沙、株洲、湘潭在经济上联结起来，逐步形成湖南综合经济中心的建议（见1982年12月30日湖南日报）。得到许多与会代表的热烈赞同。当时，虽然还没有形成具体方案，其基本构想是十分明确的：方式是三市“经济联结”，即经济一体化；目标

是构建湖南多功能的综合经济中心；目的是能够通过各种渠道，发挥工业中心、科技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情报中心和服务中心等综合功能的作用，带动全省城乡经济的发展，促进四化建设。18年之后的今天看来，其基本观点和框架构想仍然是正确的。

1983年5月，在机构改革中，把我推上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经济研究所所长岗位，成了“双肩担”。该年9月，我在院经济所组成了《城市及经济区——长株潭区域经济研究》课题组，并列入国家“六·五”重点课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的专项研究课题，及省软科学的重点课题。

1983年冬天和1984年春、夏季，我和课题组的10多位同事用了约4个月的时间，先后深入到三市的主要部门和基层单位，进行了调查研究，召开大小座谈会50多次，收集了三市经济、社会、科技的大量数据，200多篇文字材料，400多个企业的卡片，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在这个基础上，向中共湖南省委和省政府提出了决策建议性的总体和专项的实施方案。

1984年10月上旬，在枫林宾馆一次由省委领导召开的会议上，时任省委书记的毛致用对我说：省委准备召开专题会议，听取你的《方案》的汇报。该年11月10日，省委召开了常委会，省委、省政府和省政府主要职能部门及三市的主要领导人，听取了我《关于建立长株潭经济区方案》（总体方案）的汇报。会议一致认为这项“建议是可行的”，决定把建立和搞好长株潭经济区，营造湖南多功能的综合经济中心，“作为振兴湖南经济的战略重点”。同时，议定了建立长株潭经济区经济技术协调会议制度和三市市长联席会议等事宜，决定成立长株潭经济区规划办公室，并就《关于建立长沙、株洲、湘潭三市经济区的问题》，发出《中共湖南省委常委会议纪要》（第十六次）。1985年1月24日，在时任副省长的陈邦柱主持下，召开了第一次三市市长联席会议，进入了《方案》的实施阶段。

在省委常委会对《方案》的讨论中,我再三提议规划办公室的工作应由戈华主任负责(时任省计委主任),我作为专家提出《方案》,省委、省政府采纳了,我的任务也就完成了。但戈华主任坚决不干,建议由我负责,最后议定由我主持规划办的日常工作,省计委协作处和三市计委、课题组各抽调二人参加办公室的具体工作。从1985年元月至1986年秋,在省政府分管领导的主持下,先后召开了二次市长联席会议。为贯彻“联席会议”的决定,三市先后有机械、交通、金融、城建、商业等12个部门,就行业的发展联合、协调和开发举行了联席会议。根据省委常委会议《纪要》的精神,启动工作着重抓了包括金融改革、电讯、供电、交通、供气、经济技术开发区选址,以及城市合理布局、环境治理、组建企业集团和银团贷款等十大工程,在五个方面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一是实现了三市银行结算票据的直接交换和建立同业资金拆借市场,突破了纵向封闭的资金管理体系;二是推进了跨区企业集团的组建和相应银团贷款的支持;三是制定了实现三市电话同城化和与全国30多个城市的电话直拨工程建设计划,初步筹集了工程建设资金;四是从三市城市群总体合理布局的高度,逐市研究了各市城市规划的修改意见,并进行了综合论证;五是在三市结合部建立统一的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选址工作,提出了三个不同的方案,并进行了初步的比较论证。同时,在解决三市的煤气供应问题上,就分建与合建进行了比较测算,三市电厂改造的时序与规模,以及合作治理环境、特别是湘江严重污染的治理等方面进行了磋商。在《方案》实施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不仅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和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而且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由于长株潭经济一体化,是我国第一个内陆省区域经济的-体化,这种以城市为中心和依托建立经济区的思路,当时在全国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新华社提供中央领导的参阅件《国内动态清样》,以“经济专家张萍建议建立长株潭经济区”为题,1984年7月

15日出了专期。世界经济导报两次(1984.5.14、1986.5.19)、中国日报(英文版1985.1.22)、经济参考(1985.1.19)、经济学周报(1985.1.21)、湖南日报(1985.1.23)、富民周报(1984.9.4)、长江开发报(1986.5.11)等报刊先后向国内外作了报道。1986年5月,日本国国土研究中心干事长平田干郎来华考察,从东北到上海、南京再到长沙,就建立长株潭经济区的研究进了交谈和考察,他认为这项研究和《方案》“探索出发挥城市中心作用的新路子”,给予很高的评价。该年10月,北京市10个政府部门组团来湘考察建立长株潭经济区的问题,之后,参考我们的《方案》,建立了以北京为中心包括河北省的廊坊、张家口、承德等市,组成了环京经济协作区。

然而,1985年的第五次省党代会,到1986年的省人代会,都有一些代表提出不同的意见,认为“长株潭是湖南经济最发达的区域,还作为发展的战略重点,这太不公平了”等等,由于这种观念的影响,从1986年秋,省里有关领导对长株潭经济一体化的实施就逐渐不过问了。规划办公室的工作也就无法开展。1987年5月,我向省政府提出辞去这项兼职的报告。“金三角”经济一体化也就此夭折。

长株潭经济区的建立和实施探索的曲折过程,给人以深刻启示和历史的教训。其他方面不说,如果按照当时的设想,从1985年起,在三市结合部的最佳区位,筹建一个统一而不是分割、分散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实行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分片开发,滚动式发展,就能抓住和充分利用沿海辐射的最好机遇,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一个以新结构、新布局的新市区将会屹立在三市结合部的湘江之畔,不仅长株潭区域的发展面貌与今则大不相同,对全省经济的发展也会产生重大影响。这是一个多么令人痛心的深刻的历史教训啊!

1995年10月,在省第七次党代会期间,在陈叔红提议下,时任三市市委书记的秦光荣(长沙)、陈叔红(湘潭)和程兴汉(株洲)经

过磋商,决定重提长株潭,把长株潭经济一体化作进一步的探讨和实质性的推动。1996年11月由三市市委、市政府和省社会科学院在株洲市联合召开了“长株潭经济区发展研讨会”。1997年三月,也就是在13年之后,长株潭经济一体化重新提到省委和省政府决策的议事日程,成立了由储波省长任组长的长株潭经济一体化领导小组,并由省计委牵头制定专项实施规划。1999年2月,省委书记杨正午、省长储波主持召开专题会议,会上明确提出长株潭经济一体化是湖南迈入新世纪、发展经济的一项重大决策与战略举措,必须统一认识,科学规划,重点突破,加快实施。会议认真讨论了交通、电力、金融、电信和环保等5个专项规划,它标志着长株潭经济一体化迈入了一个新时期。在我提出这项建议的第17个年头,终于取得了共识,重新启动了,这使我感慨万千,兴奋不已,人生有几个17年啊!

三、牵动两省领导的湘粤经济关系研究

20世纪80年代,我国实施沿海地区改革开放试验的主要地区是广东。最有条件利用沿海改革开放带动效应的是毗邻广东的湖南。但是,两个地区由于市场发育的程度不同,特别是较大的政策差异,给湖南也带来了“南海潮”的猛烈冲击。毗邻广东的湖南怎么办?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战略措施可供选择。

一是,“封锁门户”。如80年代中期的几年,从湘北的岳阳地区到湘南的郴州地区,近千公里通向广东的公路线上,设有上百个封锁的关卡。关、卡、堵与反关、卡、堵的“战争”相当激烈。

二是,“打开门户”。撤卡停“战”,打开门户,以开放对开放,以开放促开发,既充分利用机遇,又尽可能地化不利为有利。

究竟采取哪种战略措施?又采取什么方式和如何具体化?城乡议论纷纭,这是当时湖南面临的一个重大战略选择和实际的难题。正在“湖南工资和广东物价”的矛盾反映十分强烈的时候,

1987年11月,中央领导提出广东省作为全国的综合改革试验区。这对湖南震动很大,特别是城市有点“火上添油”的浓烈气氛。在这个紧迫的时刻,1987年12月21日,时任湖南省省长的熊清泉向我交待了任务,要我带一个“小部队”也就是精干的调研小组立即赴粤调查研究,其任务是三句话:1、广东全面综合改革试验究竟准备怎么搞;2、广东全面改革试验对湖南会带来什么影响;3、湖南应该怎么办?并嘱咐:要采取“侦察”的方式,不要直接找“官方”,并要求在1988年1月10前返长汇报。但当时国家建委周干峙副主任主持的一个城市规划课题,要组织评审鉴定,邀我去参加,我说明立即去有困难。熊省长说,那就先把你的“侦察兵”派去,你在北京开完会立即乘飞机直接飞广州,不要再在长沙停留了。随我去考察的三位同志于该年12月23日去广州。我于12月26日由北京赶到广州。我们采取“走亲访友”的方式,找在广东省委、省政府工作的湖南“老乡”,找研究单位的朋友、同行,运用多种灵活的方式,边调查、边分析研究,边整理材料,按时完成了任务,形成了《关于广东作为综合改革试验区的考察与对策思考》的调研报告。1988年1月8日回到长沙。1988年1月9日上午和11日上午,我向熊省长进行了汇报。根据调查分析,我认为广东综合改革开放试验对湖南的发展会产生双重影响:有利有弊,利大于弊。应采取的对策方针是:因势利导,趋利避害。提出了五条对策建议,其中具有长远意义的有:一是以长株潭为核心,以衡阳和岳阳为南北两翼,逐步形成京广和湘江沿线的城市开放带和产业密集带,形成湖南自己实力比较雄厚的经济核心和内外辐射源基地,即现在的“一点一线”。二是建立以衡阳为中心,郴州、永州、冷水滩为次中心的湘南改革、开放试验区。在汇报过程中,边汇报,边议论,边修改即将向省人大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的初稿。汇报议论的一个结果是,在“试验区”前面加个“过渡”,熊省长认为建立改革开放过渡试验区的建议十分重要,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了出来。之后由湖